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一〇期 ——
(二〇一一年八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8a)

【各抒己见】	绝版的价值——《清华蒯大富》自序	许爱晶
【书刊评论】	《清华蒯大富》——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史书	一 丁
【史实辨析】	关于清华大学武斗调解的通信	陈楚三
【文革一页】	陶铸主政时的中宣部	郝怀明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各抒己见】

绝版的价值——《清华蒯大富》自序

• 许爱晶 •

笔者声明：本书是众人劳动的成果。本人尝试用“还原加讨论”的方式研究文化大革命典型人物蒯大富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大学的政治斗争。本书是学术性的，本书不是演义，更不是小说。本书与那些用真名实姓演义故事的书泾渭分明。

在中国，一本《红楼梦》，可以产生一个“红学”。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必然产生“中国文革学”。而“中国文革学”的研究规模和重要性远在“红学”之上。

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研究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某一段历史一样，必须首先搞清历史真相。然后在此基础上总结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供后人参考，让后人少走弯路。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也有人说历史是人民写的。

笔者认为历史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常常由胜利者来写成。但历史过程中当事人的真

实言行，包括当时的真实想法是无法改变的。史实不容打扮也不由胜利者斧削。历史真实只有一个，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终究要说话！

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十余年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有若干重大事件和若干重要人物必须研究。本书介绍文革重要人物之一蒯大富，并把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政治斗争的真实场景还原给有兴趣的读者。

蒯大富是被国家主席刘少奇当靶子打的一号学生反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平反的一号学生造反派。清华大学是毛泽东实现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阵地。研究蒯大富及清华文革是文革史的经典课题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特殊的经历和影响是文革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他的成败教训无论对学者还是对后代青年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书详略有异地展示了蒯大富、王光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不同处境时的所作所为。

文革开始时，蒯大富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生，他用文字和言论质疑工作组，这完全属于合法行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领导工作组发动万人围剿蒯大富，关他禁闭，限制他的人生自由。面对排山倒海之压，蒯大富孤身抗战，被迫绝食抗议，可谓气壮山河！这是中华民族争取人权、争取民主的历史进程中的经典案例。

沧海桑田，1969年11月12日，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病逝河南开封。刘少奇失去人生自由，被开除党籍，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我们是否经过严格的程序，刘少奇正当的公民权、申诉权是否得到保证？对此做全面严肃的检讨，这同样是中共党史和中华民族法制史上的经典案例。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也曾经拿着党章和宪法向中央会议要求发言权，这是为什么？惊天案例岂容忘却！

历史人物的经典篇章往往是在身处劣势之时，而得意之时或得意之后往往留下败笔。本书人物众多，蒯大富之外最精彩的应该是王光美。

王光美整蒯大富之后不久，斗转星移。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调动雷霆万钧之压，王光美落入蒯大富手中。王光美在三十多万人的批斗大会上遭受不堪之辱，被王光美整得死去活来的清华井冈山战士当面审问她，可以说是因果相通。但细看王光美面对民众声讨写出的检查和对义愤学生的应答，不得不承认身陷逆境的她政治原则性之强、智慧之高、语言之周圆。反映出王光美确有超群的才华，这同样是经典不凡的篇章！

及至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天崩地裂！文化大革命宣告失败。在1980年底，庭审张春桥时，蒯大富出庭作证。特别检察厅规定蒯大富的证词不准提党中央，不准提毛主席，只能提张春桥。他们对证词反复修改，改到一个字都不能动，要蒯大富背诵一百遍。连语调动作都设计好，排演多次。开庭时向全世界转播蒯大富的表演图像，暴露执法者的无聊与虚伪！正派之人视之，无不痛惜蒯大富形象和人格跌落到人生最低谷！

回首翻天覆地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权与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希望真能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当然前提是立法本身要民主，法律本身要维护绝大多数公民的权利。悲剧不容重演，当权者更应深思！在人权、民主、法制方面搞双重标准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

历史研究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读者和笔者对历史的认识既有差异又在变化，是非成败另当别论。当事者回首过去应该首先到自身找原因并勇敢承担责任。

对于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无论是真心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还是主张在中国推进西方民主的，都应从本书展示的历史真实中找到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

本书展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大学的政治斗争。请注意：从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到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宣传队开进清华，整整两年，虽然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团派占有诸多优势，但根本就没能一统天下，清华没有建立起合法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到本书初版中共已执政62年，唯有这两年清华处于党政领导缺失状态。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年内，仅此两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

这两年里，清华校园处于无政府、无权威的状态，这里的中国公民享有极端民主的权利。学生、教师以及工人和干部们基本不上课、不生产也不上班，随心所欲地在校内或北京街头召开会议、演说、游行，他们张贴大字报、搞广播宣传、印刷传单报纸，随处散发，甚至可以跑到外省市去搞同样的活动，串联成立组织，向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人发起批判斗争。

在清华这个最高学府里，师生们想法各异、志向不同。一万多精英在这个小王国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取得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各聚山头、打派仗，不择手段，最终激化为百日武斗。这两年里，高等学府清华付出了惨痛代价，蒯大富更是身败名裂！回首这两年，不能仅仅痛心痛惜。

清华园付出惨痛代价的这两年，其政治生态实属罕见，可谓绝版！这里成了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因此，这两年清华大学的校园史有绝顶的研究价值。清华文革初期派别斗争最后演变为百日武斗，说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有人甚至认为若干年后台湾岛的蓝绿斗争、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的某些斗争场面早在1967年、1968年清华园就上演过了。

任何历史阶段，在一个社会区域里，人们的利益和主张千差万别，都想各抒己见、各行其是。那么怎样才能让千万不同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在纷争的情况下形成健康的建设性的合力呢？怎样才能避免无谓肮脏的政治对抗给社会造成的不必要破坏呢？我们应该从清华民主政治试验场找到答案。

清华大学文革阶段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不仅对当年师生员工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影响着后来的中国社会变革。文革时，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刘延东以及贾春旺等人都在清华。而习近平是1975年在文化大革命尾声时进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的。

这两年清华的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旗帜下解决文革的矛盾。真心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人们，应该研究在一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政治统治下怎样避免当权派把公权变为私权、怎样避免专制者唯我独尊、罔闻民意，研究怎样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不是沦为任其指挥的愚民。至于那些主张在中国推进西方民主的人们，回头看看清华精英们在享有充分民主权利情况下的斗争，也可以从中寻找办法，研究在中国怎样避免出现少数权力资本操纵的弱肉强食的假民主，

怎样避免出现金钱民主、贪腐民主和混战民主。我们要从清华文革派性斗争中总结出推进大陆民主政治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从中悟出治国安民的大道理。因为这样的社会实践和试验在中国大陆太罕见了。

我们要在中国实现绝大多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基础上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我们要创造优于西方、高于过去的崭新的中华文明。

书中对文革时身在清华的胡锦涛只一句带过。但不得不承认，胡锦涛先生签名的“大字报”所反映的思想方法牵动文革矛盾之根，他此后不再介入文革反映其处境也反映其定力。

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课题，本书展示与研究的是文革中的特定课题。无论还原文革中的一个人物或者还原一个事件，除了情节必须真实之外，还必须还原文革的灵魂，这就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理论。如果不深刻理解毛泽东理论就去讲文化大革命，可谓画龙无睛，做人无魂！

研究伊斯兰国家历史的人必须熟读并深刻理解《古兰经》；研究基督教民族历史的人必须熟读并深刻理解《圣经》。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须下苦功研究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只有这样，还原的才是原汁原味、原色原状的真文革。笔者尽量用毛泽东文革理论去分析文革中的人和事。本书力图让读者完全进入到文革真实中去感受和研究。

有些自称民主派和自称左派的人从不同角度表述和评价文革，遗憾的是很多人对当年文革真实情况知之甚少，甚至信口开河！他们说的文革不是真文革、他们说的毛泽东不是真毛泽东！

关于毛泽东是非功罪的争论三千年后还会继续。但毛泽东主张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性让反对他的人永远打不倒他。毛泽东主张人民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严格监督当权者并全方位地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都是伟大的历史巨人。

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关心，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岁月。1975年毛泽东支持迟群和谢静宜并批评刘冰和邓小平。当年毛泽东支持迟群和谢静宜，并不是支持他们身上的毛病。毛泽东是坚持自己在教育战线的政治主张和办学方向。因为清华最能代表中国教育的方向，也最能代表中国的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要看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毛泽东逝世，迟群照样落得被判刑的结局。从全局看，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包括在教育战线的失败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应当另作他论。

早在1964年春节毛泽东谈话就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

1964年到2011年已经过去四十七年了。教育改革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越来越糟糕。目前学校培养人的方向和方法都存在严重弊病。

行笔至此，不妨看看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曾被划为大右派的钱伟长先生关于教育的言论：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

综观当今，表面可见到发展繁荣而内里滋生腐败。钱伟长先生这种正确的教育思想似乎已经被视为脱离实际，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教育思想更被当作是天方夜谭。当今教育战线、文学艺

术战线、整个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极其严重、极其危险的。无情的现实必将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如果社会和学校培养的大部分学生只关心自己，只想升官发财成为掠夺者，让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加速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哪里会有真正的人权，哪里会有真正的民主！如果再不认真重视教育问题，再不解决学校培养人的方向和方法存在的严重弊病，社会前景堪忧！

笔者尝试还原绝版的历史人物蒯大富和绝版的清华文革真相，研究人权、研究民主、研究文化教育，总结教训，共同探寻中华民族光明之路。希望我们的学校包括清华大学真正培养出一大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出一大批保护地球资源、根治环境污染、善于解决复杂矛盾、主持社会公道的栋梁之材！

民主、民主，人民要在经济上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执政、执政，永远不允许对民众专政！任何政党和政府违背这一点都是反动的！

愿中华民族不断进步，愿社会更美好，愿人民更幸福。

笔者谨以本书恭贺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二〇一一年元月六日

~~~~~

#### 【书刊评论】

《清华蒯大富》——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史书

• 一 丁 •

“开篇不说蒯大富，说尽文革也枉然”，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在读了《清华蒯大富》（许爱晶编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一书后，觉得不无道理。

文革中，被称为学生“五大领袖”的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曾是我的“偶像”（我想也是无数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国不变色、党不变修”而冲锋陷阵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偶像”）；而今天，我作为一个收集文革资料并企图研究文革又有浓厚文革情结的人，在读了许多妖魔化文革的文字和胡编乱造的所谓《文革纪实》后，十分期待能早日读到他们的回忆录，了解他们真实地人生经历，特别是在斗转星移、地覆天翻的今天，能听到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对自己评价的声音。

五大领袖中，北师大的谭厚兰，1970年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8年后，又以清查四人帮名义被捕，1982年11月，年仅44岁还没有成家的谭厚兰离开人世，把辉煌和遗憾留给了历史！她再也没有写回忆录的机会了！

最先出版的是《聂元梓回忆录》。2005年4月，聂元梓给我寄来她亲笔签名的回忆录。虽然之前知道她对毛泽东称《北大一张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不甚理解，对江青、中央文革有意见，但没有想到王若水为她的回忆录所作《序言》中竟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这样恶毒的话，让我顿时大失所望。《聂元梓回忆录》给我的印象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竟然不是马列主义者！不过，总体而言，聂元梓回忆录还是值得一读的。她15岁追随兄长、姐姐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父亲也抛家弃业参加抗日，全家牺牲两位烈士的经历令人感动；书中披露的历史事件真相，对文革研究十分宝贵；文革后那个曾保证“永不翻

案”的人“一看到儿子的腿就想到聂元梓”，硬是把儿子跳楼的时间提前4个月栽赃到判决书里，聂元梓被判刑17年；在看守所里五年不见天日，严重缺钙，假释出狱后住着双拐，北大不予收留，致使聂元梓20年无家可归，没有工资，没有医疗，不能不令人同情！同时，也不能不为这位老革命愤愤不平。

2010年10月，我收到要宝钟先生所著的《蒯大富》一书的电子版——又是一部纪实文学！书中的不少观点不能苟同，如：“毛泽东的种种失误，直接导致了文革的惨败”、“江青虽然在政治上追随毛泽东，在文革中不遗余力地支持造反派，但也正是这个江青，又配合其先生，将造反派广大群众送进了历史坟墓”等等；书中一些调侃、贬低毛泽东的话语让我不能容忍！如“中共中央在人们心目中，简直成了《群神图》，而毛泽东就是此图中的释迦牟尼”、“从南方返京的‘中国上帝’终于扭转乾坤，毅然决然，一挥而就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夫妇双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伟大领袖气急败坏地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等等。……还有，书中把文革中众所周知的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曾担任过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西安交大男性学生李世英写成了“女同学”，把服过量安眠药自杀写成“跳楼自杀”，把写给党组织、家人、全班同学的三封遗书说成“给早已划清界限的恋人写了一封《绝命书》”……如此杜撰，能叫“纪实”吗？

2011年5月，我得到许爱晶编著的《清华蒯大富》一书（先是武汉杨道远同志给我的复印本，后又得到正版），认真拜读后，觉得这是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史书。

《清华蒯大富》一书的最大特点是客观、真实。作者许爱晶，文革期间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头头，和蒯大富风雨同舟、患难与共45年，时间之长，距离之近，了解之深，无人可及。加之作者本人握有大量无可替代的文革史料，尤其涉及当时中央高层的言论、场景大部分内容，作者系亲身经历者，这就决定这部著作绝非像某些靠几次采访就草草下笔的轻率之作。对蒯大富，作者既不拔高，也不贬低，既写优点，也不回避缺点、错误，既写他的辉煌，也写他的失败；既写他的政治生活，也写他的恋爱婚姻。总之，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蒯大富跃然纸上，真实、可信。比如，这些年来，包括本人在内的不少人对1980年蒯大富在审判张春桥的特别法庭上作证一事耿耿于怀，认为他没有骨气，配不上造反司令身份。读了该书，才知道了事件的真相：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要蒯大富出庭作证，并许诺只要作证，就可以释放他，可以补发工资。他们对证词反复修改，改到一字都不能动，要蒯大富背一百遍，包括动作、语调、手势都设计好，排演多次。在这种交易下，蒯大富上当受骗，最终还是被判了重刑。对此，书中这样写道：“开庭时向全世界转播蒯大富的表演图像，暴露执法者的无聊与虚伪！正派之人视之，无不痛惜蒯大富形象和人格跌落到人生最低谷！”、“蒯大富后来对此也作了深刻的反省与自责，留下人生极大的遗憾。”对于张春桥，书中说道：“文革惨败，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知大势已去，及至落入牢笼，面对法庭不公，虽一言不发，但气节为重，生死之间何必奴才！追随主席一场，岂能投降！张春桥法庭之上傲然天下！”

该书的可读性还在于主人公蒯大富无人可比的“绝版”文革经历。作者在《自序——绝版的价值》中写道：“蒯大富是被国家主席刘少奇当靶子打的一号反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平反的一号造反派。清华大学是毛泽东实现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阵地。研究蒯大富及清华文革是文革史的经典课题之一。文化革命中，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蒯大富特殊的经历和影响是文革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他的成败教训无论对学者还是对后代青年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蒯大富出身于革命农民家庭。爷爷参加过新四军，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幼年蒯大富，聪明好学，成绩优秀，勤劳朴实。和别人不同的是，从小就关心政治，还“总得做出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来”，被父亲批评为“风头主义”。高中的时候，蒯大富曾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的阴

暗面（1966年王光美让工作组整他的时候，翻出了这封信。）他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18岁的蒯大富以优异成绩考到清华大学攻读放射化学专业，假如没有文革，才华出众、争强好胜的蒯大富有可能成为核工程化学领域的科学家。可是，人生没有假如！

1963年—1966年，清华大学政治空气十分浓厚：如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九评》文章等，一贯关心政治的蒯大富很快成为积极分子，他写的《出身好也要自觉革命》的文章刊登在《新清华》报的头版，校内影响很大。蒯大富始终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他上大学的机会。所以，他积极投身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是自然的。

文革期间，蒯大富作为学生头头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关注程度无人能比。该书开篇《导言——毛泽东说蒯大富》部分，列出了从1966年7月28日到1976年1月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谈到蒯大富11次之多。其中有关怀、有爱护，有谆谆告诫，也有严厉批评。1966年6—7月，当蒯大富被王光美打成“反革命”，被迫进行绝食斗争的时候，毛泽东让周恩来总理过问清华大学文革。周总理两次听取蒯大富汇报运动情况汇报长达6个小时；后来，周总理带着一百多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包括邓小平、董必武、陈伯达等）到清华召开全校万人大会，宣布为蒯大富等同学平反。可是后来，蒯大富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风头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膨胀，清华大学“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而是打派仗，聚山头，最终演变成“百日大武斗”。毛泽东指示工人、解放军进校制止武斗，遭到蒯大富团派的开枪抵抗，打死工宣队员5人，伤百人。读了这部书，我才知道，毛主席要谢静宜、迟群派工、军宣队进校制止武斗，而他们根本没有做工作，突然万人进校，兵临城下，工人不知内情，蒯大富更是毫不知情，误认为有幕后黑手，造成惨剧。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谈话五个多小时，对他们进行了恨铁不成钢的批评。毛泽东走后，竟又返回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每每读到这一幕，我的心就热乎乎的。我想，毛泽东对蒯大富的偏爱，说明毛泽东对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之深，爱之切。然而，正像本书中所说的：“毛泽东的脚跟是站在工农兵一边的，心是和工农兵连在一起的，他不会让工人受委屈。文革中这一又偶然又必然发生的流血冲突使毛泽东在运动中从依靠不成熟的学生转向依靠工人和解放军。”直到1976年3月，中央发文传达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的指示，其中又提到蒯大富：“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农民子弟蒯大富所以能成为牵动清华、影响北京、闻名全国、海外关注的红卫兵造反派领袖人物，与刘少奇、王光美把他打成反革命，欲置死地是分不开的。本书真实地把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政治斗争的场景还原给了读者。笔者保存有几个版本的蒯大富文革初期38篇大字报汇编，虽然也很珍贵，但其中缺乏真情实景和事件的来龙去脉。读者也只有通过真实场景，了解事实真相，才能懂得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何等残酷！才能理解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说的“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的深刻含义！这对于没有参加过文革的后来人尤为重要。

《清华蒯大富》一书，通过蒯大富的回忆，参阅资料，特别是参考对立派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以及被蒯大富斗争的党委第一书记刘冰的回忆录等，再现了这些场景：蒯大富写了质疑工作组大方向的大字报后，又在一张大字报上写道：“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我们每个左派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就成了蒯大富的“反革命”的证据。王光美亲自坐镇清华，指挥全

校大辩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蒯大富。把蒯大富骂成“牛鬼蛇神、反革命”，造成清华园各班、年级、系大揪“蒯式人物”、“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团”的局面。并对这些人实行隔离、看管、没收日记、审讯、按手印等手段，凡是和蒯大富有联系的人都得检查，承认自己犯了“立场错误”，方能过关。期间，自控系一青年教师被逼自杀，学生朱德义被逼走卧轨自杀的路，两只脚被压坏，成了终身残废！在朱德义住院期间，发着高烧，昏昏沉沉，每日还要向他们交出两份检查。……两条路线的斗争何等触目惊心！

蒯大富至死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清华园没有人敢支持他，他却无视这万众围剿，每天写大字报照常去应战，以一对万。蒯大富的大字报成为清华每天的焦点，实际引领着清华运动的方向。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第一次到清华看大字报，竟被不知情的蒯大富称为“胖老头”，还当众和他辩论。试想，如果蒯是高干子弟，哪能出现这种情况！？薄一波第二次亲临清华，又和正在贴大字报的蒯大富相遇，薄副总理当众讲话，批判蒯大富。这样一来，蒯大富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他哪里知道，刘少奇对他下了三点指示：（1）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2）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3）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7月4号，蒯大富被剥夺了人生自由权：不准出门，不准贴大字报，于是，他开始了捍卫人权的绝食斗争。……这正像文革中一首诗所写的：“假如我们不造反，/走资派就会整死我们，/然后，/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反革命！”

蒯大富在被平反后，进入他短暂的辉煌期：去上海、南京串联，受到张春桥约见；带王洪文见周恩来和江青；召开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会后再审王光美；当上首都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清华园兴建毛主席塑像请林彪题字（开创全国兴建毛主席塑像的先河）；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蒯大富在社会上可谓风光无限！然而，在校内却地震不断。清华大学是高干子弟、知识精英、理论精英云集的地方，蒯大富一介平民子弟，没有一定理论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是很难驾驭的。何况蒯大富自己又头脑膨胀，听不进反对意见，不能主动团结反对派，只知进不知退，对反对派的行为应对过度，致使反对派发展壮大，最后宣布成立“414总部”，与井冈山兵团抗衡。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414”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理论”就是要蒯大富把权交给他们掌管。414的理论家周泉缨曾声言“参加414就是为了搞垮蒯大富”，更能说明问题。清华大学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始终停留在“筹备”阶段。为了取得清华大学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两派政治势力表演得淋漓尽致，最后激化成百日武斗，清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蒯大富也身败名裂！清华大学的这段“绝版”历史，在这部著作里有十分详实的描述。

文革注定要影响蒯大富的一生。蒯大富离开学校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仅仅一年多时间，就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叫到北京隔离审查，关押三年后，到工厂“监督劳动”，直到1978年4月已失去人身自由8年的蒯大富，又以清查“四人帮”名义被逮捕入狱，判刑17年。从蒯大富服刑到出狱，书中披露出不少令人深思的情节：国庆35周年，邓小平搞阅兵，蒯大富、韩爱晶和魏京生一起被转移到大西北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和蒯大富一起服刑的韩爱晶刑满后留劳改场工作，像电影《牧马人》一样，找一个18岁的四川姑娘结婚；蒯大富刑满后在胡耀邦的帮助下重返宁夏铝厂。服刑期间，蒯、韩每逢节日或是生日，写诗填词，互相赠送，读着那些闪耀着思想、智慧之光的诗句，总让我百感交集。

蒯大富出狱后直到今天的种种经历，更有些传奇色彩，被称为“蒯大富现象”。在同学、朋友，工人、农民、老电影演员眼里，蒯大富不是“劳改释放犯”，更不是反革命，仍是红卫兵领袖、名人，大家帮他结婚成家，聘请他当“经理”，让他养家糊口。不少人争相和他合影留念。可是社会不是普通人说了算的。蒯大富被聘到北京创业，王光美不容被赶出京城；戚本禹约他去常州谋生，省委下令把他赶出江苏；最后，终于在深圳安了家。蒯大富利用“名人效应”，加上自己灵活机动的生意经，事业做得红红火火，给深圳创了不少税收。但是，在灯红酒绿、吃



饭应酬、风风光光的背后，蒯大富活得并不轻松。尽管政治上非常低调，还是会经常被公安局派人请去“喝茶”；为了孩子上学，爱人的户口需要迁到深圳，因为是蒯大富的配偶，有房有车有文凭也不行，无奈采取“协议离婚”的变通手段。蒯大富说：中央有关部门1993年说过，六十岁我们就不管他了。爱场面、爱热闹的蒯大富借此在六十岁时大宴宾客，高朋满座，其中有原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和韩爱晶等文革人物，有文革中被他认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深圳大学首任校长，有廖承志的亲属，贾春旺的侄子亲属，深圳市原市委宣传部长，企业党委书记、企业家等等，当年的死对头、414理论家周全缨参加并朗读自备的祝词。整个宴会“蒯大富现象”的典型写照，展示了蒯大富的身份与风格。

《清华蒯大富》一书在介绍蒯大富的同时，“还详略有异的展示王光美、周恩来、陈伯达、康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不同处境时的所作所为，再现文革之源”。这样一来，一些历史事件真相就展现出来，对读者了解文革，研究文革弥足珍贵。比如，1970年前后清查“五·一六”问题。1967年夏天北京出现过一个秘密组织“五·一六兵团”，主要矛头对准周总理。人数很少，早就处理过了。时隔两年，为什么又在全国范围清查五一六？不少省市借清查“五·一六”大抓造反派（据资料披露，湖北省抓68万人，还有的省市更多更惨。）许多优秀的已经进到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头头被诬为“五·一六”隔离审查，长期关押。这样大的全国性的事件，源头在哪里？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林彪？本书虽然没有真正说清楚，还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解答了部分疑问。

本书采取“还原加讨论”的方式，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加上讨论和评述，尽量历史地公正的评价文革，评价毛泽东。不像有的回忆录，只谈个人或自己那个组织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和悲惨遭遇，不敢深究文革，更不敢触及现实社会。比如，书中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话题时，作者感叹道：“住房改革让房地产商和批地的官员暴富，让土地的主人买不起房；教育改革让学校成为发财的高雅之地，而平民子弟上不起学；医疗改革让药品流通增加吃回扣环节，老百姓看不起病；经济体制改革把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改到少数人名下，两极分化。”——一切中时弊，直率，精辟！

《清华蒯大富》一书的可贵之处除情节真实外，还在于再现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的理论。基本上是在理解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前提下阐述历史的。

《清华蒯大富》一书中有插图、照片70余幅，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为本书增光添彩，十分珍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华蒯大富》是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史书，无论是文革研究者，还是对文革有兴趣的人，无论是文革亲历者，还是青年人，都应该读一读。至于本书的不足，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对毛主席的文革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明确阐述出来，有吞吞吐吐、犹抱琵琶的感觉。对此，笔者能够理解，毕竟有人对蒯大富和作者还不放心，还要定期请“喝茶”！第二，书中多处把清华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报，写成《井冈山报》，这样就和414派的《井冈山报》混淆了。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立场不同，对事物的看法必然不同。对一本书也是一样。文革中，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少人信誓旦旦，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少地方群众组织为了争“正确”，争“响当当”，打得头破血流。但是，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的基本理论是什么？恐怕很多人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很多人是在失去领袖以后的社会现实给予的启示和教育下，去思考文革，理解文革的。著名军旅作家巍巍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对文革很不理解。后来，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教训，国内人民公社解体，国有企业

私有化、工人下岗、官员腐败、贫富两极分化、黄赌毒泛滥、环境资源破坏、道德沦丧等等现状，使他不得不思考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2006年，巍巍在为拙作《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尚未出版）写的序言中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40年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化，这场大革命越发显出重大深远的意义和耀眼的光芒。尽管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着种种争议，甚至巨大争议，而且还会持续下去，但那种盲目的否定和轻率的否定，显然越来越难以立足了。我以为，只有从人民长远的利益出发，广泛收集历史资料，严肃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实践，才是正确的路子。”魏老的这段话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

【史实辨析】

关于清华大学武斗调解的通信

• 陈楚三 •

〔按：《清华蒯大富》一书出版后，有关韩爱晶等曾到清华大学调解武斗一事引起一些争论。陈楚三给孙怒涛的这封信代表了争论中的一种意见。陈楚三、孙怒涛，均为当年清华大学四一四总部委员。〕

怒涛兄：

关于老蒯所提停止武斗一事，我已经看到有关通信往来内容；我也很关注。

韩爱晶等三人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这是韩的书中记载并一再坚持，而沈如槐断然否认的。韩的书中并没有具体时间和地点。具体时间，你我在宛平当面问老蒯时，他答是68年7月上旬；孙耘则引用韩爱晶说法，是5月上旬。

米鹤都采访、老蒯口述的正版《岁月流沙》（以下简称《流沙》；正版口述已经更名为《潮起潮落》，因与马小庄、陈继芳的书名相同，所以我仍用原名），概述了清华武斗过程；而韩爱晶所写、老蒯阅看并认可的《清华蒯大富》（以下简称韩书），也以相当篇幅介绍了清华武斗过程并有不少比较客观的评论。

对比《流沙》和韩书对于清华武斗的叙述，虽有所不同，但在至少两个重大关节点上却是一致的：一是武斗发生的关节点，他们都说，414抓陶森是“武斗的导火索”；二是武斗停止的关节点，蒯说在武斗死了人后，他就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坚决不同意”，韩书则说，韩爱晶、王大宾、鲁文阁曾经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韩在给你的信中说“调解武斗失败”。

给读者的印象，是414点燃了清华武斗的导火索；武斗开始后，蒯大富“后悔”了，想停止了，又是414“坚决不同意”，所以才一直打到“7·27”。你看，是414挑起了武斗，也是414拒绝停止武斗，清华武斗的责任不就应当由老四承担吗？

怒涛兄应当记得，2009年底你给我发来叶志江的《救美》网文，说我是科学馆的卫戍司令、带着人给他“下马威”云云，我给你回信予以否认；但因是网上文章，我并未理会。今年叶志江出版了《走出文革》一书，《救美》亦在其中；白纸黑字，我不能视若无睹，于是致信叶公，提出异议。现在，《流沙》虽是网文，韩书可是白纸黑字，所以我不能不予理会。

怒涛兄关注“韩爱晶来清华调解武斗”的事是否发生过。我则既关注韩爱晶是否确有“调解清华武斗”的行动；更关注蒯老弟是否真的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涉及清华武斗的责任问题，在40多年后的今天竟然还有争议，我不得不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只许老团放火，不许老四点灯，公平吗？

《流沙》说：“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力系的旧电机馆”；韩书也说：“414绑架团派干部陶森，两派矛盾空前激化，这是导致清华百日武斗的导火线。414对百日武斗有严重责任！”

如果说，韩爱晶对清华团派的作为不甚了解（也可能是不愿了解，或者“为尊者讳”），也就罢了；但老蒯也这样误导读者，我就不得不质疑了：414抓陶森是68年4月20号的事，可是团派早在1967年12月4日就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吕应中，68年1月30号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罗征启，3月27日又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贾春旺等人，4月4日绑架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并致其死亡，4月14日又绑架支持414派的干部文学必等人（见邱心伟书）。这些事实，老蒯是不知道，还是有意回避呢？

老蒯和老崔（兆喜）在宛平聚会时向我道歉，原因就是团派保卫组曾于1967年12月20日绑架并残酷殴打我。在绑架我的那一天，20多名支持414的干部和教师被团派抄家，41名414的各级负责人被团派点名“通缉”（见邱心伟书），难道老蒯的这些动作对414还不“重”，还不“过”吗？

在绑架我之前的1967年10月20日，团保卫组就曾闯入我所在战斗组活动的房间，绑架并毒打我班同学李××；1968年3月16日，团保卫组又在圆明园绑架了我班同学邢××，刑讯逼供近五个月，直到工宣队进校后的8月份才被释放。据邱心伟书中记载，到1968年6月上旬，团派扣押四派多达70余人。

为什么团派接二连三地抓、打414的头头，肆无忌惮地绑架414派学生和支持414的教师、干部，好像都和武斗无关，而414一抓陶森，就成了武斗导火线呢？请问蒯、韩二位，这是哪一家的逻辑？

（二）蒯老弟，你真是“巴不得停止武斗”吗？

《流沙》提到：“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当时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

我们不知道老蒯是否真想停止武斗。除了1967年4月15日冲广播台是老四主动挑起的以外，其余较大的冲突都是团派主动挑起。因此，如果老蒯真想停止武斗，很简单也很容易：解除对414头头的“通缉令”，保证414头头的人身安全；停止绑架414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已经绑架的立即放人，两派交换“俘虏”；停止攻打414的据点，解除对414据点的封锁，让414自由进出科学馆、自由进出学校；然后两派拆除工事。老蒯只要这样做了，清华武斗自然斗不起来。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老蒯指挥下的团派实际做的又是什么？

按老蒯对你我询问的回答，韩爱晶等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发生在7月初；可是，7月4日，团派开枪打死科学馆朱育生；7月5日，团派开枪打死科学馆杨志军；7月6日，团派开枪阻止414给科学馆送菜的土坦克，打死杨述立；7月9日，团派火烧科学馆；7月16日，团派炸塌科学馆414为外撤所挖的地道；7月18日，团派开枪打死从外地回校的女生钱萍华。这些血的事实，与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说辞，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如按韩爱晶的说法，韩等三人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发生在5月上旬；那么：5月2日，团派攻打土木馆；5月7日，团派绑架校人事处朱坚等6名414派；5月8日、9日，团派绑架谢引麟等三名414派女生，关押、拷打3个月之久，还绑架了姚毅、赵汝广同学；5月10日，团派攻打科学馆、动农馆；5月12日，团派攻打8号楼；5月14日，团派攻打汽车楼；同日，团派绑架孙华栋，并将孙华栋活活打死；5月21日，团派再次攻打汽车楼；5月30日，团派攻打东区浴室。面对这些事实，我又怎么能相信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呢？

韩书中提到清华“5·30”武斗时，援引了老蒯的回忆说：“当时有人摔死了，我们攻不下来。我就下死命令叫他们不要再冲，他们还往上冲”。老蒯“下死命令”却不起作用，如果此言不虚，也许老蒯当时已经控制不了团派的大局了？也许，蒯老弟确实想叫停武斗，而一些团派头头坚决要打而否定了蒯的意见，这是真的吗？

（三）老蒯当年知道“414拒绝停止武斗”吗？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群体对特定事项的反应，是可以合理推断出来的。

如果“414拒绝停止武斗”真有其事，老蒯当时能不知道吗？团派的其他头头能不知道吗？对于团派来说，“414拒绝停止武斗”难道不是一个求之不得、应该大肆宣传、大做文章的绝好题目吗？然而，在百日武斗期间，我身在科学馆，却没有听到团派广播与此相关的任何一篇文章；时至今日，除了老蒯，也从来没有听到团派的其他头头说起过此事，包括在宛平聚会中，你我就此质疑老蒯时，在场的其他团派头头也不予置评。

老蒯当年知道“414拒绝停止武斗”的消息吗？你说，“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这段话似乎表明你当时就知道此事；既然知道，为什么没有将此消息告诉其他头头和你的笔杆子？从那时起40余年过去了，你在《流沙》中才第一次披露此事，竟然保密40余年！？如此匪夷所思，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包括你老蒯在内的团派头头以及团派的笔杆子们，当时并未听说过此事。若果如此，这只能说明，“414拒绝停止武斗”的事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真的有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武斗找上门来谈，就我所了解的沈如槐，在当时“团强四弱”的形势下，他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就老四的决策传统，他更不可能背着其他老四头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擅自表态。韩爱晶说当时还有其他老四的人在场，可是40多年来，从未听到任何一个414头头或非头头提到过此事。这也只能说明，韩爱晶根本没有找沈如槐谈过停止武斗的事！

40多年后，我们才第一次听到“414拒绝停止武斗”的“新闻”，难道还不够荒唐吗？

（四）韩爱晶“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迷局

《流沙》说，关于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

按常理，《流沙》中“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这句话应当是转述韩爱晶的话；但是韩书中并无此话，韩给怒涛兄的三封信中也无此话，只说“沈的态度（按：指沈说蒯是“蒯匪”）不是外交手法拖死蒯，而是脱口而出的真情真言”。因此，所谓“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一类的话，如果不是韩爱晶“遗忘”了（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就是老蒯强加给韩爱晶的，是老蒯的杜撰，而韩爱晶出于某种原因又不便否认。

韩书中，对调解停止武斗的表述与《流沙》不同，很耐人寻味，请看：

“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等到清华找到414总部，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按照原来所谓天派、地派的关系，414派和地质王大宾较密切。虽然如此，对话时，沈如槐坚持说蒯大富是‘蒯匪’，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王大宾当场也气得高声喊起来，王大宾也认为搞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

请注意，韩书中虽然提到“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但后文却只涉及联合：沈如槐“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王大宾也认为搞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而涉及停止武斗的内容连一句也没有。韩给你的三封信中，同样如此，只涉及联合：“沈如槐愤怒指出：蒯是蒯匪！怎么能与他联合并承认他是一把手！”“王大宾也认为联合之后承认蒯为一把手是理所当然的，也大声对沈如槐。不欢而散。”关于调解停止武斗，韩书只说“调解不欢而散，无果而终”，韩给你的信中只说“调解活动失败”，而具体内容同样连一句也没有。这是否也从反面说明，韩爱晶其实并没有和沈如槐当面谈过停止武斗问题？

韩给你的信中提到找周培源谈时，只说周“以井冈山负责人身份谈井冈山才是造反派”，此话似乎和武斗也沾不上边。也就是说，韩回忆与周培源的谈话，关于停止武斗的内容同样连一句也没有！很奇怪啊！

韩书中提到“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如你所说，在当时武斗的大背景下，同时讨论这两类根本不同的问题是不合逻辑也不合常理的；韩爱晶的记忆在这里肯定出现了时空错乱。

我以为，韩爱晶记忆的时空错乱，可能是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一件是1967年9月23日，韩等人到清华，谈的是清华两派大联合问题；另一件是1968年5月5日，韩等人希望找414谈停止武斗问题（即孙耘所说邱心伟书中记载的内容：1968年5月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等负责的《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前一件确有其事，谈了，而且414最终认可了老蒯的一把手地位；后一件，也可能确有其事，但“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而既未见面，当然更未谈。

不论谁要调解停止武斗，总是有具体内容吧，比如脱离接触（停止攻打对方）、收缴武斗工具、拆除工事、解除封锁等等；可是在韩书及韩给你的信中，对此没有提一个字！是他惜字如金？还是他忘记了？既然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怎么能忘记？韩爱晶牢牢记着自己出面去调解清华停止武斗而没有成功，但是他却忘记了自己根本没有见到沈如槐！所以关于调解内容他才一句也写不出。

韩爱晶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欺骗他。韩书说，在市革委会常委会上商定，“组成调解武斗小组，首先去清华、北大找两派头头谈”；而邱心伟书中说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组织者（北京市革委会）、工作对象（清华、北大两派头头）和工作内容（武斗调查或者调解）基本一致。

看来，在韩爱晶所说的1968年5月上旬，北京市革委会的确组织了一个小组，任务是调解（或者调查）北大、清华两派的武斗，这个小组先去了北大，找了北大井冈山的周培源谈，然后又想找清华414的沈如槐谈，但“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结果没能见面，当然就没有谈！韩爱晶把此事和1967年9月23日谈大联合的事弄混了，所以，虽然他说“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但没有会谈地点，具体内容又只涉及大联合（1967年9月23日确实谈了所以记得），不涉及停止武斗（1968年5月5日没有谈成当然记不得）。

然而，韩书说此小组由三人组成：韩爱晶、王大宾和鲁文阁；而邱心伟书中说该小组由四人负责：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如按韩书，则小组中并无蒯大富，414没有拒绝的理由。但我们注意到，韩说找了北大周培源，没说是否找了聂元梓；又说找了清华沈如槐，没说是否找过蒯大富；既然是调解两派武斗，为什么只找受压的一派，不找“领袖”所在的一派谈？韩等三人不是在“拉偏架”吧？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聂元梓、蒯大富身处该小组之内，所以才不用找他们谈；也因此，该小组被414拒绝。

当然，这只是推测，解开迷局需要翔实的史料佐证。

韩爱晶说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既然如此，他理应对所谈的具体内容和场景记忆更加深刻。我期待着韩爱晶进一步提供“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细节（包括具体时间、地点，他本人以及王大宾、鲁文阁对停止清华武斗的调解意见和要求等，最好有当时谈话的记录），以最终解开迷局。

（五）剿灭老四：这才是当年老蒯的真实思想

《流沙》说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但韩书中并没有对老蒯作这样的评述，不知是不是韩爱晶对老蒯的这种说法并不认同。

老蒯接着说：“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老蒯没有说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后“我”的反应。

我说过“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在前面列举老蒯指挥下的团派1968年5月份和7月份的“行”，已经揭穿了老蒯所谓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虚伪。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和所谓“414拒绝停止武斗”一样，都是迟来的“新闻”，都是40年之后我们才第一次听到，这是老蒯在40年之后的“言”；而在当时，即40年之前，老蒯的“言”又是什么呢？请看：

1968年5月8日，团派在明斋前召开了“彻底砸烂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第三次战斗大会，声称罗文李饶等六人小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等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是四一四的反革命核心，对于四一四的反革命核心，那就是要坚决打倒。只要四一四不把罗征启交出来，不把陶森放出来，不把科学馆的工事拆除，团派的工事，一根长矛也不能丢掉。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摧毁四一四的反革命领导核心，夺取最后胜利”。（见1968年5月10日《井冈山》）

1968年6月23日，团总部扩大会议通过了《清华运动两个月总结（草案）》，其中说：“彻底摧毁清华414反革命领导核心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向414领导核心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阴谋集团宣战并且摧垮他们”，“这就是解决清华问题包括武斗问题唯一正确的途径。”（见1968年6月28日《井冈山》）

1968年7月15日，谢富治等接见蒯大富，要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时，“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刘（万章）等四头头为反革命；(3)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4)拆除414的工事。”（见韩书和邱心伟书）

原来如此！当时的老蒯，的确是“巴不得”按这四条“停止武斗”！实际上，团派一直是以这四条（我称之为蒯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老蒯的逻辑是，蒯四条表明了我老蒯“巴不得停止武斗”的“诚意”，你老四如果不接受蒯四条，就说明你“拒绝停止武斗”！我只能不客气地说，这是强盗的逻辑。

史料告诉我们，1968年百日武斗期间，蒯大富和他的团总部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对武斗毫无“后悔”之意，也没有一点“巴不得停止武斗”的意思；我们看到的是，团派不仅在行动上把武斗逐步升级，而且在言论上也是逐步升级。

1968年7月19日，《井冈山》提出的口号是“踏平科学馆，活捉罗征启，打倒沈如槐，解放全清华！”

事实证明，当年的蒯大富，对武斗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他要的正是通过武斗剿灭414，实现老蒯的一统清华。这才是历史。老蒯所谓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表白，完全是欺人之谈！

40多年过去了，看来，老蒯到现在仍然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在清华武斗的问题上力图为自己涂脂抹粉，闭口不谈团派少数打手对四派干部、学生惨无人道的暴行，甚至企图推卸制造7·27血案的责任，怪北京市事先“不打招呼”，并把具体责任推到任传钟头上！

（六）改写历史：韩爱晶的梦

韩爱晶说，如果当年调解武斗成功，就没有七二七流血，没有七二八召见，甚至没有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历史就要改写。这大概是韩爱晶头脑中萦绕40余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他太想青史留名了！

韩爱晶说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有被耍弄的感觉”，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委屈，被谁耍弄；也许，他是为自己自告奋勇出面调解停止武斗但没有成功而感到委屈，为由于“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导致自己调解停止武斗失败而感觉被耍弄。不知韩爱晶有没有想到过，其实他是被他的朋友蒯大富耍弄了！

既然是调解停止武斗，总要面对武斗双方吧？可是在韩书及韩给怒涛兄的信中，只说他们到清华找了沈如槐谈，找过蒯大富谈吗？没有提。大约可以肯定，没有找过。如果调解清华武斗而不找蒯大富谈，就只能是自欺欺人；这样的所谓“调解”，就是纯粹的骗局，就是借“调解”之名压老四屈服。

假设，韩爱晶等人确实找蒯大富谈过，结果无非两种：老蒯拒绝停止武斗，或者老蒯同意

按他的蒯四条停止武斗。而这两种结果，韩爱晶都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的。即使为了在形式上保持调解的公平，韩爱晶等人也理应按市革委会的三条（我称之为谢三条）调解，但老蒯能接受吗？他要是能接受，还会有7·27惨案吗？

1968年7月19日，《井冈山》发表社论，声称“解决清华问题的途径就是首先要坚决镇压沈罗反革命集团，谁要离开了这个主要矛盾，治末不治本，那他解决清华问题的任何措施都休想使清华运动前进半步。”

这就是老蒯对市革委会谢三条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对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回答。所以，韩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失败，既不是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也不是因为“吴德不认真落实”，更不是因为老蒯捏造的“414拒绝停止武斗”，而是因为蒯大富不剿灭414誓不罢休。韩爱晶自诩“对蒯大富的了解之全、了解之深可谓无人可及”，请问韩爱晶，你调解停止清华武斗时知道蒯四条吗？

怒涛兄，你在给韩爱晶的信中，称赞韩爱晶政治智慧超群，可是在清华武斗和7·27血案的问题上，韩爱晶的政治智慧并不比老蒯高多少。40年后的今天，韩爱晶仍然相信“清华内在矛盾本应该也能够和平解决”，我真不知道他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调解能力，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老蒯“和平解决”的意愿。对于7·27血案，蒯、韩、聂等人都把北京市革委会事先“不打招呼”作为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原因，这就更加明显是为蒯大富开脱了。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难道不是“招呼”？7月13日和7月15日，市革委会领导两次接见老蒯提出谢三条，难道不是招呼？事先也没有人给414“打招呼”，414为什么没有打工宣队，反而敞开大门、和工宣队一起拆除工事？究竟谁“巴不得停止武斗”，难道还不一目了然吗？

老蒯自己也说，当时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看到鲁文阁就在楼下，旁边的女工还穿着裙子”，“不像是为了打仗来的”，即使如此，老蒯仍然以上柴联司的下场来恐吓部下，团派仍然对工人下了毒手！有人来制止武斗而没有“打招呼”，我就对制止武斗的人下毒手，这恰恰说明，蒯大富根本不把中央和市革委会放在眼里，根本不愿停止剿灭414的武斗，根本没有“和平解决”的意愿。韩爱晶竟然看不到（或者有意遮掩）这一点，还有什么政治智慧？

所以，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活动注定要失败，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他相信能“和平解决”，而现实（老蒯的实际作为）却残酷地耍弄了他！退一万步说，就算调解成功，蒯大富愿意放下剿灭414的屠刀，也改变不了红卫兵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这个历史的大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七）今日老蒯：镇压老四仍然有理？

《流沙》在对当年的武斗进行忏悔时说：“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然而，对于团派和四一四的分歧，老蒯竟然说什么“深层次的矛盾呢，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态度。”“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就是说他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当时肯定也不认账，不承认。”

好一个“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40年前老蒯加在414头上的罪名，而且至今老蒯竟还是这样评价老四！理由就是，414的核心人物和一些干部，曾私下议论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并且他老蒯“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不是有意陷害”。

我要说，对老蒯扣给老四的这顶帽子，不仅当时我们“不认账，不承认”，就是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的今天，我们也“不认账，不承认”。毛主席是当年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紧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年我们发自肺腑的誓言。当年说我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对414的污蔑，是为剿灭414找借口；但到现在还说414当年“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则是为了证明当年武斗剿灭414有理，镇压414有理！老蒯大约忘记了，团核心包括蒯本人“私下议论”过几乎每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团派整理过几乎每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黑材料，还公开炮打过周总理、康生，又该戴什么帽子？还要提醒老蒯，你那些“强有力的证据”是怎样取得的？是靠钢丝钳拔牙取得的，是靠刑讯逼供、诱供、指供取得的，你还好意思说“不是有意陷害”！

（八）可以结论了。顺便“辟谣”。

我在修改本文的过程中，看到怒涛兄在《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里引用了陈育延的日记和陈育延的信。陈育延的信为我本文的观点提供了意外的佐证，也使我有可能是提前得出并不意外的结论。

陈育延在6月10日给你的信中说：邱心伟《大事日志》第344—345页中关于5月5日《市委调查组》的一段，不是取自沈如槐的《文革纪事》，而应当是取自唐少杰的《一叶知秋》第16页上，言词完全一致。而唐少杰的这段，又来自蒯大富、韩爱晶的口述。我曾求教唐少杰老师这段记载的来源，唐老师答应查一查但尚未回复，如果按陈育延所说，来源于蒯、韩的口述，证明邱心伟书中此段确有其事。然而，陈育延没有说，这段话中“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是否也来自蒯韩的口述？如果也是蒯韩口述，岂不证明韩与沈如槐没有见面吗？

更有意思的是，陈育延的《有感》（可不是周家琮的那篇《有感》）中担心怒涛兄的《追寻记》“一步步引导韩爱晶犯错误”，于是，当他（按指孙怒涛）写到第十二集时，我便着了急，我想帮助韩爱晶，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继续查资料。没想到，还真查到了68年5月4日的工作笔记上有一段。

5·4 市革委会讨论结果：

- 1、讨论地质东方红小报上关于大事记的问题。1.此大事记是反动的。2.
- 2、蒯要求谢付总理处理我校问题，谢说处理不了。
- 3、组成调查组。刘绍文组长，蒯、聂、韩、王（大宾）、谭组成（王、谭反对）。

（摘自1968年5月4日工作笔记）

这段陈育延当时的笔记，恰恰证明了我在前面《韩爱晶“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迷局》中的三个推断：1.1968年5月初，北京市革委会确实组织了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2.聂元梓、蒯大富身处该小组之内；3.所以414拒绝该调查组，韩等人未能见到沈如槐，当然就没有谈！陈育延的这段笔记，也至少说明了韩爱晶记忆的两个错误：1.不是武斗“调解组”而是“调查组”；2.参加人是邱心伟书中所说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而不是韩书所说的韩爱晶、鲁文阁、王大宾三人。

我不去追究“调解”和“调查”的内容和目的有何不同（但这种不同是显然存在的），我只想，如果蒯大富参加韩所说的“调解”，以韩爱晶的政治智慧，难道认为武斗当事人也可以担任武斗调解人吗？

陈育延以这段笔记调侃怒涛兄说：这回孙怒涛可能真的是“他妈的，又打偏了！”本想打韩

爱晶的，现在却伤到沈如槐了！依我看来，很可能是育延学妹“打偏了”，本想帮韩爱晶的，现在却帮了沈如槐！

陈育延的结论是：1968年5月初，市革委组织了武斗调查组，意在制止武斗。韩爱晶、王大宾来清华调解过武斗，找到沈如槐，但未谈成。

我的结论是，1968年5月初，市革委组织了武斗调查组，意在制止武斗。韩爱晶、王大宾等试图来清华找414调解武斗，但因调查组中有蒯大富，被414认为不公平而拒绝；韩爱晶等没有见到沈如槐，未谈成。

顺便提一句，育延学妹很坦率，日记也很生动，但当时的日记也难免片面性吧！

在摘引了9月24日工作笔记后，陈育延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从9月21日下午到今天又进行了四次谈判会，毫无进展！今天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都来参加了我们的谈判会（聂元梓中途退场）。韩爱晶和王大宾都被414这种极端无赖的态度所激怒，王大宾说：“414太滑头了！”（声音很大），韩爱晶干脆站起来拍桌子大骂，414在很尴尬的情况下拒不签字退出了会场，真是一幕政治斗争中的滑稽戏，岂有此理！

陈育延没有写414拒不签字的原因。实际上，如她所记录的，王大宾发言“蒯第一把手，底下一边六人”，414是同意的了。

此事韩书中也有记载（P. 316）。“双方初步达成协议，确定核心组成员比例为团总部7人，414总部6人，下层各组织机构按对等原则双方在协商原则下实现联合。但团派又提出要团派9人，414派4人组成核心组；414总部代表十分气愤，退出会场。”

看起来，“极端无赖”的是团派，他们推翻了初步达成的协议，又提出团派9人，四派4人，414才拒不签字的。414并不是像陈育延所说“很尴尬”，而是如韩爱晶书所说“十分气愤”地退出会场的。说“岂有此理”的应当是414啊！

我不讳言，韩书确有许多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史实，也有许多相当深刻的见解；《流沙》同样有很多观点是我也认同的。不过“求同”并不妨碍“存异”，也不妨碍“质疑”。如果说已经逝去的历史是一头大象，我们在探寻它的时候就要力求避免陷入“瞎子摸象”的困局；我们必然会有局限性，但在我们视野范围内应当力求忠于事实，力求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我的态度。

祝好！

陈楚三 2011. 5. 17初稿 5. 20修改 6. 23补充

附录：韩爱晶的三封邮件（已征得孙怒涛同意）

孙怒涛：你好。

- 1、调解武斗的事，我会当件事认真对待。我已钻进另一个题目资料之中。
- 2、如果有人能查阅北京市革委会记录就会一目了然。
- 3、包括当时去北大调解，有条件时我也会同时求证。
- 4、文革中我去北大清华先后找周培源、沈如槐直接为北大清华停止武斗搞大联合进行对话都

只有一次。

5、4 1 4 当时也并非沈如槐一个人。

6、我们是坐下来，面对面对话的，开头还很客气，后来沈如槐愤怒指出：蒯是蒯匪！怎么能与他联合并承认他是一把手！

7、沈的态度不是外交手法拖死蒯，而是脱口而出的真情真言。

8、他的认识与我当时思想认识距离太大。王大宾也认为联合之后承认蒯为一把手是理所当然的，也大声对沈如槐。不欢而散。沈如槐一开口，苏北味，当时我惊讶我、蒯、沈三人是老乡！

9、原来我一直没有反对过老四，直到1968年7月，有一天，在体院养病时听到老四广播台在骂：蒯大富、韩爱晶之流……我火冒三丈说：我又没对你老四怎么样，还特别在大会上强调，只要不参加武斗的，一视同仁好好接待。听此广播，我当即打电话回北航，广播把4 1 4的轰走。可见年轻感情用事。

10、快半个世纪的细节各有所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辅相成、相反相生！

保重！

韩爱晶 2011.05.06

孙怒涛：你好。

我确认1968年去清华调解武斗并见沈如槐是真实的。

我所述参与者包括沈如槐记不起或否认可以作为疑点。

这件事从市革会开会……红代会工代会沟通……两派参与……先去北大见过周培源，很客气，戴助听器，以井冈山负责人身份谈井冈山才是造反派……去清华见沈如槐不欢而散……调解活动失败……有被耍弄的感觉……后来在多种场合谈此事……甚至多次表示如果当年市革会认真对待我的建议不会有七二七……写书搜集资料，从邱心伟大事记中只见到一句……详见邱书中李钟奇多次调解，才明白干部、军官们对我建议不积极的原因。

这件事对别人可能只是一个不在意的事，他们忘却不奇怪。这件事是我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后来与蒯也多次谈起。确实、确实，我相信会有确凿历史证据来说明。

至于你问：从1967/01/01到1968/07/27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是不是只见过沈如槐一次？你唯一见到沈如槐的那次，是不是就是你在《清华蒯大富》P339中所写的那次？

我在书中引过一句话：说有易，说无难。

从1967/01/01到1968/07/27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别的场合如果与沈如槐见面机会也不少，比如1967年8月5号在天安门上，他书中写向总理问问题，那个问题是我问的。

我说一次，是指文革中重大政治交往。

保重！

老韩 2011.05.08

孙耘、孙怒涛：你们好。

1、调解武斗，确有其事，总有一天北京市革委会有关会议记录解密会确凿证明这一点。应该是1968年，邱心伟大事记上提过一句。

2、我们去北大、清华调解武斗，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等原因最终失败。

3、其后几十年里，我多次在各种场合为调解武斗失败痛心和遗憾。

4、如果当年调解武斗成功，就没有七二七流血，没有七二八召见，甚至没有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历史就要改写。

5、2010年蒯大富、李自茂等去四川，王大宾也证明有此事。

6、过去近半个世纪，细节要考证很正常。

7、孙怒涛总要用一个什么公式来推论历史事实，似不可取。

谢谢！

老韩 2011.05.18

□ 原载《记忆》第七十三期

~~~~~  
【文革一页】

陶铸主政时的中宣部

• 郝怀明 •

1966年6月6日上午，党中央新任命的中宣部部长陶铸到部上任。此时，办公楼内已是大字报满墙。“阎王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 陶铸初到中宣部

陶铸精力充沛，马不停蹄，高速运转。当天，他首先接见了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收发室的同志，称赞他们放出了革命的第一枪。

接着，他同副部长们和处（局）长们见面。他说：在座的相当多的人是认识问题，我对同志们寄以希望。对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也还寄以希望。总的责任在彭真、陆定一，我们应负多少责任就承担多少责任，犯多少错误就改多少。思想认识问题，主要靠自觉。像我们这些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谁个没有错误，讲清楚就是了。问题是要改，改了就好。

陶铸的这番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感到几分温暖。

中午，陶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会上讲话说：过去的中央宣传部，是修正主义的、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是彭、陆、罗、杨反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信心把中央宣传部变成革命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搞阶级斗争的宣传部。进行这场斗争的方针是坚决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问题。不论是谁的问题，有什么揭什么。充分揭露以后，再来分析，实事求是地定案。他要求犯有反党罪行的人彻底交代问题，指出只要真正愿意重新做人，党是允许革命的。他号召：“彻底捣毁阎王殿，把中央宣传部变成革命的中央宣传部。”

当天，中央书记处决定：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四人停职反省。陶铸说：“周扬有病，暂不停职反省，让他安心休养。张子意是老革命，要区别对待，不停职反省，要照样送文件给他看。”

当天，根据陶铸的意见，绝大多数党支部进行了改选，选举“真正的左派”领导各支部的运动。

第二天，成立中央宣传部临时联合办公室。主任为新到任时间不长的国内宣传处副处长吕少泉，副主任是阮铭。阮铭是部办公室的一般干部，行政16级，不久前，因为他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同聂元梓等站在一起，在部里还处于挨整的状态。不料，《文艺座谈会纪要》出笼，他抓住机会，同阮若瑛一起写了一篇《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并上书江青，陈伯达即令正在郊区搞“四清”的他返城，江青召见后，即按照中央文革的旨意进行修改，令他时来运转。陶铸到中宣部走马上任之前，中央文革不知是哪位领导向他介绍了阮铭、阮若瑛的情况，说到中宣部后可找他们两位。陶来后对阮铭很器重，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陶铸在对待中宣部几位领导同志的问题上，应当说，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是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6月8日，他在中宣部所属各单位干部会议上说，陆定一有时很“左”，现在我也不认识他是什么人。周扬在文艺方面过去是个权威，有才华，我也很尊重他。对许立群，我在延安时就认识他，直到东北时期，对他印象不坏，他在好的领导下可以做许多工作。在当时对“阎王”们的一片“打倒”声中，陶铸能够这样讲，还是比较客观和公道的，是很不容易的。他还叫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代表他给在天津养病的周扬打电话，要他好好养病，并特意派人前去探望。

6月14日，陶铸召开工作队员和各支部正副书记会议，宣布中宣部文化革命工作队成立，张平化任队长。张平化来京前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陶铸在讲话中说，运动的主要锋芒，要对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黑线，解决敌我问题。强调要划清界限，用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来划清界限。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抵制、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左派、右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要在运动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他还说，不要把那些错误性质严重的人看做铁板一块。什么阎王、判官、牛头马面，都是纸老虎，是泥巴，是稻草，是木雕、泥塑，一击即垮。

新领导很有魄力，讲话很有感召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了“彻底捣毁阎王殿”的斗争。不管真积极也好，假积极也好，半真半假的积极也罢，反正是统统卷入到了运动中来了，各色人等的分化和组合，各种人物的表演，一幕幕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开始了。

#### ◇ 我对运动的态度

我也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部领导的号召，投身到运动中来。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接一篇，火药味一篇比一篇浓。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叫：“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必须“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的威风扫地”。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革”结束后我才知道，此事是康生策划的“北大点火，往上搞”的阴谋。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大讲“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样一场搏斗中，丧失警惕是危险的。”还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被吃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6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6月3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以及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同时

配发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说：“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6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咄咄逼人地提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火辣辣的煽动性极强的语言，在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中不能不让你热血沸腾。

我在“阎王殿”没有做过多少工作，没有什么账可还，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党和人民培育了我，我一定要积极参加运动，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当资产阶级保皇派，一定要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周围，保卫红色江山，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不久之后，通过学习下发的文件，知道“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原来出自林彪之口，当时我觉得这话讲得好。尽管也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也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但此时已完全放在了脑后，大势所趋，不由你不努力跟上。这就是“文革”初期我的基本态度和总的取向。所谓“积极”，其实主要也就是照着文件上或报纸社论空表态，促老处长揭批“阎王殿”。由于自己来部里时间不长，没做过多少事，就我所做过的一点工作和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想来想去，实在也想不出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的。后来好不容易总算想出了一条：中宣部的办公室没有挂毛主席像（大礼堂除外）。当时还郑重其事地批了一通。

#### ◇ 一些中层领导的态度

当然，对于阅历较深、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老领导来讲，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对一些处长们来说，在运动来临的时候，他们当然也是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干革命的。既然毛主席已经给中宣部定了性，那么，他们就得来揭发、交代，甚至认罪了。但他们在思想上又怎么也想不通，中宣部怎么会是“阎王殿”，陆定一、周扬等部领导怎么会是“阎王”呢？即使在工作中有些不同的意见，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他们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自己又怎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搞，现在这么搞对不对呢？

从部长到处长，都处于极度的不解、不安和痛苦之中。

在天津养病的周扬对陶铸派来探望自己的同志们说：“这样闹下去是不行的啊！国家要出事啊。就没有人向毛主席说一声吗？”“江青她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的，怎么能这样搞？打倒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文艺界的同志们是一直跟党走，拥护毛主席的嘛。”（露菲：《生无所息为人民》，《忆周扬》第546页）

理论处处长陈道对说中宣部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心里也很抵触，难以接受。在处里的揭批会上，他在口头上不能不承认自己“有罪”，但又很不服气，他反问自己：“难道我对毛泽东思想一点感情也没有吗？”

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全处的揭批会上则公开表示，他不认为中宣部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他自己不去揭露什么“黑线”，也不同意别人去这么做。他公开为林涧青、龚育之辩护，在全处的会议上说：“咱处的同志我都信得过。林涧青、龚育之既有革命的积极性，又有修正主义的积极性。龚育之若在一个好的领导下，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一定会像姚文元、戚本禹那样发挥作用。”

出版处处长包之静根本否认陆定一长期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也不赞成对陆压制毛主席著作出版的指控，他坚持认为陆定一这样做是“为了反对粗制滥造，是怕出纰漏”。他说，

1961年起草的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的文件，提出克服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的问题，心是好的。

理论处副处长洪禹，在口头上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心里又觉得委屈、苦闷。这位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经过考验的老革命，再次表现出了他的硬骨头精神。他在会上发言针对张平化在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他的意见：“对毛泽东思想怎样才算忠诚了，高举了？说说容易，不但要看过去，还要看运动中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他说：“揭露黑线是革命的，但也要实事求是，把问题说得越严重越好，那不是革命！”别人给他贴大字报，凡是不实事求是的地方，他都要加以“说明”或“解释”。在批斗他的会议上，他仍然坚持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都可以一分为二的观点。他说，毛主席说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为什么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能一分为二了呢？他的这种看法，那时遭到的自然是一通批判。他非常苦恼地说：“现在的气氛，很难使人讲话，连‘说明’都不允许，难呀！难呀！”“还看不清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左派的标准是什么？不能认为过去负责任多的，比如处长，都是右派；凡是负责任小的干部就是左派！”

干部处副处长郝一民贴出一张题为《十天来错误的检查兼为阎王殿的将校以上军官排队——履行管人事的‘牛头马面’副手应例行的职责》的书面检查，以调侃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运动的认识和情绪。他说：“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十天来扪心自省，感觉尤深，可以说一天等于二十年。不联系实际，不把自己摆进去，毛泽东思想是学不好的，林彪同志用字当头，活学活用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我想错了，大不过杀头（主席政策不可能），罢官有可能（一定会给饭吃），黑帮打黑枪我不怕，将来隐藏下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棍子，不必想那么远，总之为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保卫毛泽东思想胜利，把我字抛到九霄云外，对了活着跟毛主席走，死了去见马克思，错了活着重新做人，死了去见考茨基。”他给部长们和处长们排了个队，“阎王爷的位置：大阎王——‘一贯正确’地蛮横霸道，明红实黑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野心家。二阎王——赫赫一时三十年代‘一贯正确’的文艺界学术界的权威。几名主将——年轻力壮‘善文有理，能说会道’硬钻死爬的‘一贯正确’的主将。一名老将——心怀不满，善于随机应变，坚决追随大阎王的‘老黄忠’。阎王殿的参谋长——不吭不响，‘胸怀大志，精明强干’，誓死效忠阎王的参谋长。一个根本共同点：‘一贯正确’？”“‘将校’级角色排队：1、牛头马面和判官；2、忠实的奴才，或贾贵的后代；3、驯服的工具（有的挨过棍棒，有的思想共鸣）；4、明驯暗不满的准备逃跑懦夫；5、叛逆的英雄（极个别或者还得发现）。”对他自己，他说：“我是十级干部，大约相当‘大校’，在阎王殿主管人事副手，我从最坏处着想，暂且列入牛头马面判官之列，对我的一言一行，从早到今，诚心地心悦诚服地欢迎同志们手枪、机关枪、大炮加重炮轰击我。我们这些大小都是有嫌的甚至有罪的，怎能不还？还清就能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将来为人民做出有益的贡献。当然轰击时，感情上是难受的，但毛泽东思想加上‘眼而通’，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一旦毛泽东思想在你的灵魂深处占据了阵地，你就精神解放了。”郝一民的这张大字报当时被批判为“暴露了他的反动阴暗心理，同时向党施放了很多恶毒的暗箭”。这篇大字报隐晦曲折地道出了这位处长当时的真实的思想。虽然在高压下不得不跟，不得不做这样的“检查”，但在思想深处，他并不认为“阎王殿”、“阎王”们，以及他本人，真的有什么可以构成“罪行”的问题。当然在态度上还是要表示欢迎“重炮轰击”，愿意“重新做人”了。可谓中宣部局级干部在“文革”初期的态度中让人赏心悦目的一景。

陶铸说得对，含义也很深：“陆定一有时很‘左’，现在我也不认识他是什么人。”试问，在中宣部的其他部长们和处长们以及普通干部中，又有谁能够认得清楚陆定一“现在”是“什么人”，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从思想上完全认同毛泽东对陆定一和中宣部的判定呢？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www. cnd. org /

---